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蚊虫多、苍蝇多,病原微生物生长、繁殖加快,食物容易变质,容易饮生水、生冷食物,诱发各类传染性疾病。南通历史上夏季常见的传染病主要有: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和副伤寒、细菌性痢疾、霍乱、流行性腮腺炎、手足口病、细菌性肠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布鲁氏菌病等。

1. 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经蚊传播,多见于夏、秋季。临床上发病急,有高热、意识障碍、惊厥、强直性痉挛和脑膜刺激征等临床表现。南通地区 1953—1971 年,乙脑发病率波浪起伏,50 年代发病率为 1956 年最低,为 0.25 每万人,1953 年最高,为 1.56 每万人;60 年代发病率以 1961 年最低,为 0.18 每万人,1965 年最高,为 2.66 每万人,平均发病率高于 50 年代;70 年代发病率除 1971 年 3.04 每万人为历史最高外,1972 年后,随着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的全面推广,“乙脑”发病率逐年下降,均在 1 每万人左右,1972—1987 年各年发病率均在 0.5 每万人以下。

2. 伤寒与副伤寒

伤寒是由肠沙门菌肠亚种伤寒血清型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副伤寒是由肠沙门菌肠亚种副伤寒甲或乙或丙血清型引起的一种和伤寒相似的疾病。副伤寒甲、乙的症状与伤寒相似,但一般病情较轻,病程较短,病死率较低。副伤寒丙的症状较为不同,可表现为轻型伤寒,急性胃肠炎或败血症。伤寒或副伤寒可因水源和食物污染发生暴发流行。本病分布我国各地,常年散发,以夏、秋季最多,发病以儿童、青壮年较多。南通地区1949年10月1日—1958年平均年发病率1.66每万人,1959年增至12.72每万人,1960—1963年发病率分别为10.00每万人、8.33每万人、9.37每万人、5.99每万人,1964年后逐年下降,发病率在2每万人左右。70年代平均发病率2每万人左右。80年代在1—3每万人之间,呈散在发生。

3. 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由志贺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由细菌感染导致了直肠、乙状结肠的炎症及溃疡,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里急后重等主要症状,大便为黏液脓血便。南通地区痢疾病数占肠道传染病的首位,历年来发病率波动较大,1959年发病率为97.08每万人、1965年为105.46每万人、1966年为101.41每万人。平均发病率50年代为41每万人左右,60年代为47每万人左右,70年代为32每万人左右,呈逐年下降趋势。80年代发病率在16.28—38每万人之间。

4. 霍乱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病发高峰期在夏季。霍乱弧菌存在于水中,最常见的感染原因是食用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霍乱弧菌能产生霍乱毒素,造成分泌性腹泻,即使不进食也会不断腹泻。19世纪20年代,霍乱自海外传入我国,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并向内地扩散。江苏沿江一带,首当其冲,每次长江流域霍乱大流行,南通地区的沿江地带均受波及(中医将霍乱、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等疾病统称为“痧疫”)。严重流行之年,人命朝不保夕。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大规模预防接种的推广,古典生物型霍乱极少发生。

5. 流行性腮腺炎

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全年可发病,但以春、夏季较多。发病1~2日后出现颧骨或耳部疼痛,然后有腮腺肿大,体温上升可达40度。通常以一侧腮腺肿大后2~4日又累及对侧。早期患者及隐性感染者为传染源,患者腮腺肿大前7日至肿大后9日,能从唾液中分离出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患者主要是学龄儿童。病后有持久的免疫力。可通过接种疫苗预防。

6. 猩红热

猩红热既是冬、春季容易传染的疾病,也是夏季容易传染的疾病。猩红热为A组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称之为“烂喉痧”。其临床特征为发热、咽峡炎、全身弥漫性红色皮疹和疹退后明显的脱屑。少数患者病后由于反应而出现心、肾、关节的损害。患者和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经空气飞沫传播,也可经由皮肤伤口或产道感染。人群普遍易感,但发病多见于儿童,尤以5—15岁儿童居多。1962—1967年南通猩红热发病率为0.30—0.79每万人,1971—1987年发病率为0.40—26.35每万人,其中以1974年26.35每万人最高。

对于夏季传染性疾病需要及时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勤通风、勤换气、注意个人卫生,从而减少传染性疾病发生。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清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军继大东沟海战惨败后,又失守平壤,退据辽东。日军则气焰嚣张,扬言要扩大对中国本土的进攻,战争大有蔓延到东南沿海之势。南通、海门居东南海疆中段,又扼长江入海要冲。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考虑加强通海防务由谁来担此重任时,首先想到了状元及第后因父亲去世在家守制的张謇。

早在吴长庆军幕期间，张之洞就想将张謇揽到自己身边。吴长庆去世后，张之洞再度延揽张謇，并赠予“四十金”。张謇虽一再婉辞，但心存感激。两张相识，有近20年之久。张之洞很快“奏请朝旨，任余（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团练是当时一种地方武装。

张謇虽然对训练团练以抵抗日军侵略的前景并不乐观,但仍然接受任命,草拟了《海防团防营制》《民

团续议》等章程，又提出一系列训练措施以及对付日军的办法，如《通海防歌》云：“沿江沿海有沙滩，滩多洪曲碍轮船，日便分兵犯我境，大炮小船不能运。”“若论内地尽是沟，天然地营不要谋……道路原是本地熟，层层深入他不取。”张善铎以“书二十四桠付典肆，抵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为多人倡”。因不久后《马关条约》签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团练已无用武之地，张善铎奉张之洞命，将训练五个月之久的通海团练遣散了。但是张善铎此加强了他与张之洞的联系，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南通当地的声望。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八项主张》，提出立国自强八项主张，“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成为两人的共识，交往更加密切，在南京多次就筹办商务、学务做“长谈”“久谈”。不久，张謇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宣布放弃仕途，投身“实业救国”。虽然，此举主要由张謇自己决定，但“实业救国”是他与张之洞经过交流形成的共识，尤其是张之洞据此上奏朝廷，决定派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这对于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通从此不仅开启了创办近代实业

的进程，而且确定了张謇在其中的领航地位。

创办实业从哪里起步？张謇通过“通沪六董”呈报张之洞：“拟在通州城西唐家闸地方水口近便之处建设纱厂，拟名‘大生’，先办纱机二万锭，以本地所出之棉，用本地习纺之工，即以纺成之纱销于本地及邻近州县。”张之洞完全认同张謇的主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查通州、海门为产棉最盛之区，西人考究植物，推为中国之冠；……吾不亟就该处兴办纱厂，则民间此项漏后无从而塞。”张之洞的奏折很快获光绪帝朱批：“知道了，钦此。”张之洞上奏获准，为南通实业先办纱厂的计划开了绿灯。

张謇起初试图依靠“完全商办”形式,解决纱厂需要的资金与机器设备问题,遭遇很大困难。恰巧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曾计划建立南北两个纺织厂,后来只有北厂开工,原先为南厂订购的机器设备,一直搁置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得到张之洞允许,这批机器设备作为入股投入了大生纱厂。纱厂虽因此由“商办”变成“官商合办”,但减轻了筹集资金的压力。这是张之洞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帮扶了张謇一把,也证明了他俩之间的默契和历史机缘。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初始,就有开辟“海门滨海荒滩”植棉,以解决纱

厂原料供应的打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与张之洞筹商,垦牧植棉的计划得到支持。六年后,通海垦牧公司为官方批准创立,成为继大生纱厂后,张謇在南通创办的我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农业股份制公司。

大生纱厂投产初期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方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乱很快向东南地区蔓延，大生纱厂经营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张謇往南京参与策动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大臣刘坤一等领衔与西方国家谈判，得到积极呼应，结果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确保了东南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

张之洞对南通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謇对张之洞做过“南皮（张之洞为直隶南皮人，借指张）要是可人”“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等较高评价。但是，张之洞在其中也起过负面作用，例如将通海厘捐改为“产地统捐”，引起通海花布商恐慌。张謇曾数度致函张之洞历诉“统捐利弊”，倡议由“商民认捐”。还往南京与张之洞及其幕僚为认捐事“辩论二十日”，终归失败。张謇对张之洞这一不恤民情、擅夺民利的做法非常不满，对其亦有“南皮是反君子”等评价。

如此,张之洞在南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双重印记。

南通市区行政区划大调整已将近一年。目前南通辖有崇川、通州、海门三区和如东县、启东市、如皋市、海安市。而历史上被南通管辖过的区域更多,区域范围共涉及江浙沪三省市。

江苏省内的泰兴、靖江都曾全境被南通管辖过，而张家港、扬中则局部从属过南通。另外泰州、东台、大丰等地也都曾与南通划在同一行政区内。

清雍正二年(1724年),通州升为直隶州,划如皋、泰兴二县归通州管辖。这样的格局直至清末都没有改变。整个清代,泰兴被南通管辖长达187年。不仅如此,当时的泰兴还领有众多的江上沙洲,这些沙洲是后来构成扬中岛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扬中市的前身太平厅成立,通州直隶州辖有的复生洲、复德洲、在我洲、太中洲等被划出,成为太平厅的一部分。今天扬中北部很大一部分曾属于南通管辖区域。

与泰兴接壤的靖江历史上长期属于江南,清代属于常州府。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的1934—1938年,靖江隶属于区署设于南通的江苏第四行政督察区(南通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靖江仍为南通所辖。靖江在解放后划归泰州专区。

与南通相毗邻的张家港也有一小部分曾直属于南通。民国的南通县曾在长江上辖有一个岛屿乡镇——刘海沙乡。南通解放后，已与江南岸的刘海沙被划入常熟，现在张家港市常通港以北地区即是原来的刘海沙地区。

此外,我党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8月成立的苏皖边区第一行

政区不仅涉及今天的南通地区,还囊括了东台、泰县(今泰州)、台北(今大丰)、崇明、泰兴、靖江等地,该行政区驻地于如皋如城。

相比江苏境内地区,崇明被南通辖的历史更加为人所熟知。这是因为一方面,南通管辖的崇明的历史特长,另一方面,崇明脱离南通地区的时间很晚。崇明自五代十国设镇开始从属于南通。直至南宋仍属于通州明清时崇明虽先后归属苏州府和太直隶州,但在1933年划入了江苏第一行政督察区(第二年改为第四行政督察区,即南通区),重新返回南通。1951年12月,崇明自南通专区改隶上海市南通专区由七县降为六县。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之前崇明所从属的是县为主体的南通专区,而不是以崇川为中心的南通市。当时的南通专区和南通市是并列关系。

江苏与上海的部分地区曾从属于
通的情况容易理解。但浙江与南通并

接壤,浙江也有地方从属过南通吗?这个从属于南通的特殊地区就是现在位于舟山群岛北部的嵊泗县。因为民国时的嵊泗属于崇明县的一部分,因此嵊泗列岛也就在南通的管辖之内了。

尽管嵎泗与南通之间隔着茫茫大海，但南通确实在嵎泗有过实际管辖。1935年，江苏省派出高级别视察团赴嵎泗考察，南通区专员葛覃也在内，江苏省第三水警区（驻南通）区长朱爱周、南通大达轮船公司的经理也一起前往。这次考察在嵎泗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是当地首次高规格、高系统性的政府主导考察活动，并形成价值极高的科学资料。1946年11月，作为崇明第五区的嵎泗脱离崇明，改为江苏直辖，从此南通终结了对嵎泗的管辖。

南通历史上的区划范围涉及区域广泛,正显示了南通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紧密。如今,即使没有区划变更,南通与各地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顺畅,各地在日新月异的交流中迎来新发展。

笔者所见如皋耀如电灯公司民国37年(1948)3月份上半月收费存根,编号为00427号,正文显示:邱升(陞)中学于是年3月15日缴纳电费420000元,用电度数5度,上次抄录为504度,现在抄录为509度。收据右侧有电灯公司铃印,仅见“皋、电公司”等字。

时,邱升在如杀敌的故事,颇有影响。今日如皋人熟知的靖海门,就是邱升抗倭旧址之一。

薛承宗在《谈邱升中学创校经过》中追忆，1938年秋，正逢日寇侵犯，当时他正出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二团团长（如东邱升中学校网记述他时为如东县县长，很不准确），驻守双甸以东地区。崔家河一战，力挫日寇锋芒，皋东局势方才稳定。考虑如皋城内失学青年众多，又思抗战急需人才，于是薛承宗邀请乡绅出资，奖掖后生学习邱升抗日，于马塘镇北十五里王袁乡许家楼，创办了邱升中学。校长为薛承宗，校董为海安韩国均（举人，江苏省原省长），如皋宗孝忱（书法家、国学家），如皋陈端（留美经济学硕士，甘肃省财政厅原厅长），如皋黄坚铨（黄埔军校教官、军制史专家）等乡绅名流。

教师有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景陶、中央大学毕业的吴北晨、交通大学毕业的沙学鉴、约翰大学的沙海镜、浙江大学的朱之、北京大学的陈津之、无锡国专的陈桥等等。1939年，薛承宗升任国民党中央保安第一旅旅长，不久后兼任如县长（管辖今如东一带，当时如皋西北部，均已沦陷）。学校离驻军地很近，薛等人的努力下，学校新建大礼堂一座、教室四间、厨房与厕所等。至1940年一学期，学生人数为250多名。1941年，日军垂死挣扎，侵犯皋东，学校前邱场海货滩上课。此后情况，薛承宗有记录。

查阅《如东县志》及《抗日烽火中“草棚学校”》(薛雨泉),邱升中学内部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学生中不少人思想进步,十分爱国。抗战后期,升中学接受共产党苏中区党委领导。

1944年，邱升中学与耕茶中学、南通中学、东台中学，于东台三仓鲁灶庙组建“苏中第二联合中学”（后更名为“苏中第四联合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邱升中学迁回原址。可惜耀如电费收据所记的1948年，邱升中学是年所在地，诸多书文未曾记述，但根据“迁回原址”，又查阅《吴皋教育志》等书，邱升中学当时应在如皋马塘附近。事实并非如此，抗战胜利后，如皋城第一次解放。后来，苏中七战七捷后，新四军北上。国民党重新回到如皋，邱升中学又迁回如皋城（如皋冯际余老人回忆）。

这份耀如电费收据的发现,有以下三点价值:1. 邱升中学于1948年的战乱年代仍然在运行;2. 如皋耀如电灯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皋东地区;3. 票面上显示“7折优惠”,可见如皋耀如电灯公司对于本地教育事业是十分支持的。